

## 伴随文本对非裔美国女性社群书写的建构

方小莉

**摘要:** 伴随文本随着符号文本同时发送,隐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外或文本边缘,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伴随文本决定了文本的解释方式,严重影响文本的意义阐释。本文以当代最具代表性的3位非裔美国女作家为考察对象,通过研究非裔女性小说的生产性伴随文本和解释性伴随文本,包括副文本、型文本、元文本、先/后文本、全文本以及前文本语境压力,来探讨当代非裔美国女性性属思想的变化及社群观念的发展。

**关键词:** 格洛丽亚·内勒;艾丽斯·沃克;托妮·莫里森;伴随文本;社群建构

**Abstract:** Co-text decides the way of textual interpretation. Concealed within and without the text, co-text plays a very active role in constructing meaning of the text and exerts great influence to interpretation.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African American women's ideas on gender problem and community building,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co-text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American women's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ara-text, archi-text, meta-text (commenting-text), successive text, omi-text as well as the pre-text.

**Key words:** Gloria Naylor; Alice Walker; Toni Morrison; co-text; community building

**作者简介:** 方小莉,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站博士后,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符号叙述学,英美文学研究。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当代英国女作家‘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编号:15YJC752029);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编号:Skzx2015-sb3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声音的权威:美国黑人女性小说叙述策略研究”(编号:14YJC752005)的阶段性成果。电子邮箱:clever-wing@163.com

DOI:10.16234/j.cnki.cn31-1694/i.2016.02.006

格洛丽亚·内勒(Gloria Naylor)是美国当代知名的黑人女作家。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内勒与很多同时代的非裔美国杰出女作家一道,在重新定义美国文学的新发展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Nelson 1999: 372-373),也为自己在美国文学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事实上,评论界一开始就将她的作品与莫里森和沃克的作品相提并论,她与后两位作家并称为当代美国非裔女性文学中的圣三一(Holy Trinity)(Montgomery 115)。国外对内勒的研究成果早已汗牛充栋,而中国大陆的内勒研究则刚刚起步,仅出现期刊论文10篇左右。大多数的期刊文章都主要研究内勒小说中的种

族、性别问题;①另外也有文章讨论了内勒小说中的叙述、意象分析、魔幻现实主义等。

“社群”毫无疑问是黑人女性一直致力书写的主题,内勒也不例外。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内勒依次发表了5部作品《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The Women of Brewster Place*, 1982)、《林登山》(*Linden Hills*, 1985)、《妈妈·戴》(*Mama Day*, 1988)、《贝利的咖啡馆》(*Bailey's Café*, 1992)、《布鲁斯特街的男人》(*The Women of Brewster Place*, 1998)。前4部作品之间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每一部小说都向读者展现了一个黑人女性的社群。在这个集体里,黑人女性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用自己的生命丰富着彼此的生命”(Whitt 1)。她的每部作品都书写着黑人女性不同的故事,这些故事相互联系,则构成了具有代表性的黑人女性集体的故事。在这样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社群建构中,男性是被边缘化的客体。直到1998年《布鲁斯特街的男人》的出版,内勒通过一个新社群的建构,解构了以黑人女性为中心的社群观念。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主要关注内勒小说文本中的性别、种族和阶级问题,有少量研究也涉及到内勒小说文本中的社群建构。事实上,内勒的小说包含了丰富的伴随文本。②“伴随文本决定了文本的解释方式。这些成分伴随着符号文本,隐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外或文本边缘,却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严重影响意义解释。”(赵毅衡 2011: 141)本文从符号学的角度切入,通过对《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和《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中一系列伴随文本的研究,并结合艾丽斯·沃克与托妮·莫里森的相关作品,探讨黑人女性性属思想的发展及社群观念的变化。

内勒在1998年发表了小说《布鲁斯特街的男人》。该小说由10个章节构成,包括一个开场和结尾,中间的第二章到第八章分别讲述了7个黑人男性的故事,第九章将这些黑人男性汇聚成一个整体。顾名思义,这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故事,小说一开场却主要是探讨布鲁斯特街的男人和女人们之间的关系。小说的第一个叙述者本(Ben)甚至明言“我认

① 林文静《姐妹情谊:一个被延缓的梦——解读格洛丽亚·内勒小说〈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林文静《玛利亚·夏娃故事的重写——格洛丽亚·内勒小说〈贝利的小餐馆〉的女性主义解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10期;曾艳钰《再现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种族与性别——评当代美国黑人后现代主义女作家歌劳莉亚·奈勒》,《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4期;朱姗姗《黑人女作家格洛丽亚·内勒〈妈妈·戴〉中黑人母亲形象解读》,《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② 伴随文本是落在文本外的记号,它是伴随着一个符号文本一道发送给接收者的附加因素(赵毅衡 2011: 141)。

为任何男人都离不开女人,而任何女人也离不开男人。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不能违背。”(Naylor 1998: 7)“对于布鲁斯特街的每个男人来说,无论他是谁,在他的故事中总有一个她。”(8)小说随后从本的故事开始讲起,分别讲述了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们在这个被白人世界隔离的空间成长的故事。在每一个男性故事中的确都有一个“她”,他的母亲、爱人、妻子、邻居等等。但是令读者感到奇怪的是,小说中关于女性的个人信息基本被省略,而这些女性在小说中也几乎没有正面出场,只是出现在男性人物的回忆或讲述中。这让人无法不质疑小说企图边缘化女性经历,这与小说的开场相矛盾。另外小说叙述者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省略了很多信息,但却显出一副读者预先早已知道该信息的语气。例如巴兹尔讲述了他的成长故事,主要情节是他一直偷偷隐藏在母亲周围,不敢去见她,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深深忏悔,并开始学习做一个像母亲那样的人。同时他回到老家,找到了父亲,并发现父亲等了母亲一辈子。在整个故事的讲述中,母亲玛蒂(Mattie)只出现在两个男人的回忆中,玛蒂是谁,她发生了什么事,什么导致了巴兹尔、父亲、母亲分离,这些重要的信息几乎全被叙述者刻意省略。读完整部小说,读者感觉只读到了每一个故事的后半部分,而整个前半部分则不知去向。这种情况下,只局限于小说的文本部分已无法解决阅读中遇到的诸多问题,此时只能从文本外的伴随文本入手全面考察小说。“伴随文本控制着符号的生产与理解,它是文本与世界的联系方式。任何符号文本都携带了大量社会约定和文化联系,这些成分都会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赵毅衡 2013: 215 - 216) 本文将从内勒小说的生产性伴随文本<sup>①</sup>和解释性伴随文本<sup>②</sup>入手,来探讨黑人女性性属思想的变化及社群观念的发展。

## 一、先后文本及其它: 格洛丽亚·内勒 冤家姊妹篇中的完整社群

《布鲁斯特街的男人》包含了大量、丰富的伴随文本。从显性伴随文本来看(副文本和型文本),该小说是格洛丽亚·内勒的代表作,从标题上来看,与内勒的获奖作品《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仅有一字之差。《布鲁

<sup>①</sup> 文本生产之前已经加入的伴随文本,包括前文本以及与文本同时产生的“显性伴随文本”即副文本和型文本(赵毅衡 2011: 153)。

<sup>②</sup> 文本被接收解释时加入的伴随文本,包括元文本、链文本(同上)。

斯特街的男人们》中的故事直接来源于《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可以算是该小说的续集,因此两本小说构成先/后文本。“在符号表意中,一个文本不仅受制于先出的文本,也不得不受制于后出的文本。”(赵毅衡 2011: 149) 当两个文本是先后文本的关系时,对任何一个文本的阐释都会影响另一个文本,而对任何一个文本的阐释也都会受制于另一个文本。由于两个文本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不得不把它们进行合一阅读。

事实上,作者与出版商一开始就将两本书视为先后文本,强迫读者合一阅读。看到其中一本,自然会联想到另一本。<sup>①</sup> 从人物来看,我们在读到小说的故事之前,先读到了作者特意留下的一段话:

#### 作者笔记

作者承认本这个角色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已经死亡。但是作为文学创作,她有权利复活他的灵魂和声音,让他负责讲述该小说的大部分故事(Author's Note)。(Naylor 1998: 扉页)

这样,小说还没有开始讲述故事,读者就不得不将两本书联系起来。接下来小说开篇第一页就首先引用了《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描写了布鲁斯特街女人们的日常生活。读过《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的读者,会强烈感觉到先文本中的人物一个个活生生地跳入了眼帘:

布鲁斯特街变得尤为偏爱她黑皮肤的女儿们,因为即使它不断衰落,这些女儿们依然努力打拼,试图将其建设成为自己的家园。她们用深肤色的手臂支撑着自己伏在窗台上,她们扛着杂货用粗糙的乌木色的大腿一步两个台阶地爬上楼,她们用藏红花色的带子在后院晒衣服……(3)

当然随着故事的叙述,读者还可以读到其他从《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直接引用的文字。这样,两本小说中的人物则相互交织在一起。先后文本中出现的人物相互认识,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布鲁斯特街就是他们天然的联系。共同生活在布鲁斯特街这个被外界遗弃的世界里,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拥有共同的命运。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

<sup>①</sup> 小说有的版本封面就标明“《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的作者”(“the Author of *The Women of Brewster Place*”)。

都是被迫来到布鲁斯特街,而他们之所以不离开是因为别无选择。其次,《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中出现的男人,除了一个小孩外,都曾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出现过。他们是这些女人的爱人、孩子、情人。

从小说的结构来看,先文本《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一共由9个章节构成。第一章叙述者交代了布鲁斯特街的诞生及故事发生的背景。接下来的7个章节分别叙述了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的个体故事和集体故事。第9章作为小说的结尾,叙述者向我们交代了布鲁斯特街正在走向死亡。内勒认为,“一个人物不能代表黑人女性,因为她们的经历是丰富多彩、各有不同的”。内勒在小说中“创造了7个黑人女性,从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黑人女性的缩微世界”(Felton and Loris 6)。可见《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与《布鲁斯特街的男人》的结构基本一致。先后文本均分别讲述了7个女性和7个男性的个体故事,并分别汇聚成一个以女性社群和男性社群为主角的群体故事。

从小说的情节来考察,先后文本的故事情节也相互联系紧密,男性与女性的故事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组成部分。两本小说中缺失的信息相互补充,互相完整。先文本《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的第一个故事是关于玛蒂。她被爱人与儿子巴兹尔(Basil)抛弃,最终一贫如洗。读者所听到的是叙述者从玛蒂的视角向我们讲述的故事,由于其爱人与儿子的故事越出了玛蒂的视角范围,玛蒂无从得知,读者也无法了解。在第一本书中叙述者没有将声音交给男性,让他们讲出自己的故事,因此玛蒂的儿子与爱人在读者心中自然留下了“罪大恶极”的形象。而在后文本《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中,巴兹尔的讲述补充了先文本中越出玛蒂视角范围的部分。后文本中,巴兹尔故事中缺失的关于母亲的部分则在先文本中早已呈现。先后文本中的其它故事也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

《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作为后文本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读者对先文本的解读,在读后文本时,读者无法摆脱先文本的影响,因此两个文本互相成为了彼此的元文本。在解读《布鲁斯特街的男人》时,读者也会同时受到对先文本的一系列评论文章——链文本的影响;而读完《布鲁斯特街的男人》后,读者也不得不以同样的方式来重新审视《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

在《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由于故事是通过女性视角叙述,她们无法深入到男性的心理,无法看到透过男性视角才能看到的事物。由于男性被剥夺了讲述的权力,男性的故事及历史则被抹杀。后文本中小说一开篇,读者便听到本(Ben)对男性主体性的强调“我的名字叫本。我等了很久才有机会说下面的话:你知道,这条街不仅仅只是孕育了女性[……]”

(Naylor 1998: 1)。本一开场就提醒读者,男性在先文本中被剥夺了话语权,他在《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中才等到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接下来本进一步阐述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密切关系。虽然有时男性会对女性造成伤害,但是他们爱她们。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生活在布鲁斯特街这样没有希望的地方,并不是每个黑人男性都祈祷更好的生活,但是“只要他们身边有女性,他就必须梦想更好的生活,因为她是他的另一半;另一只手臂,另一只眼睛”(3-8)。

本在开场点明了男性与女性互为彼此的另一半,缺少谁都不完整。正如所讲述的故事那样,缺少了男性或女性的故事,都没法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而在后文本《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中,本的目的就是“讲述整个故事”(7)。本口中的整个故事显然是将《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中遗漏的故事补充完整,这样男性与女性的故事组合起来构成整个故事。可见在阐释后文本时,前文本成为了必不可少的部分,而后文本也成为了重新认识前文本的驱动力。因此《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与《布鲁斯特街的男人》作为彼此的伴随文本,已经融入彼此的文本,读者在解释时已经不可能将两者分开,从而构成了全文本。就如同文本中的男性与女性都是彼此故事的一部分,只有双方都共享话语权,讲述出自己的故事,才能够获得完整的故事。

## 二、前文本语境压力: 艾丽斯·沃克小说中包容的社群

《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和《布鲁斯特街的男人》构成全文本,讲述了男性与女性共同的故事。自后文本产生时,读者对其中任一文本的阐释都离不开另外一个文本。先后文本彼此依存,彼此融合,相互补充。文本中所反映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如此。《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以女性为中心,男性被边缘化,《布鲁斯特街的男人》补充了男性的故事,这才使得男性与女性两个社群彼此融合,成为一个完整的集体。内勒这一思想的发展与转变与当时的整个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相依存。要弄清楚内勒思想的变化与发展,必然要考虑内勒小说产生时受到的全部文化语境的压力,文本生成之前的文化文本组成的网络,即前文本(赵毅衡 2011: 145)。

意义的表达和形成总是要受到社会规约的影响(Liu 75),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黑人女性小说中的社群几乎都被背景化为主人公的生存环境。非裔美国文学中的社群主要是以黑人中心,社群的建立要么是迫于

外部白人世界的孤立,要么则是主动联合以反抗外部白人世界的压迫。而黑人女性由于其特殊的处境,成为小说中社群建构的中心。非裔美国文学中的社群建构一直存在着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黑人与白人、女性与男性。内勒在早期的每一部作品中都塑造了一个女性社群,她们用彼此的姐妹情谊相互支持鼓励,抵抗来自外部男性世界的压迫。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的发展,美国黑人女性形成了庞大的创作群,并开始发出黑人女性群体的声音。黑人女性创作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甚至黑人男作家也感受到来自黑人女作家的威胁。他们控诉黑人女性出卖了黑人民族,因为黑人女性对性属问题的书写有损黑人男性的形象与尊严。同时,由于80年代以来,里根政府及老布什政府的保守执政,黑民众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利益遭到威胁,美国国内种族矛盾也再次突显。黑人女性在性别与种族矛盾激化的社会背景下,从自己的视角重新审视黑人社群内部、黑人社群与白人社群之间以及与世界这个大社群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黑人女性逐渐认识到“任何社群的建构都具有兼容性与排他性。社群的建构基于成员之间的彼此认同与互惠互利,而与该社群成员不同或是对其利益造成威胁的‘他者’,则被当作敌人而遭排斥”(Blackshaw 21)。在《布鲁斯特街的男人》面世之前,由于社会语境的变化,黑人女性对群体建构的观念已发生变化,她们逐渐意识到:男性与女性、黑人与白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都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关系。内勒在这一前文本的语境压力下,也用自己的后文本解构了先文本,同时让读者通过对小说文本的阐释,反窥整个历史文化语境的变迁。

考查前文本对内勒小说文本的影响,必然无法回避当代黑人女性文学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作家——艾丽斯·沃克与托妮·莫里森的影响。

沃克提出的妇女主义(womanism)影响了一大批黑人女性主义者及黑人女作家。她在其小说中也反复实践和阐释这一黑人女性主义思想。沃克1989年发表的小说《殿堂》(*The Temple of My Familiar*)由于其宏大的主题及复杂的叙述技巧而颇受争议。在小说中,沃克企图从黑人女性的视角重写整个人类史,试图在小说中建构一个独一无二、平等的妇女主义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类、动物以及整个生态系统和平共存。

《殿堂》将小说中的地理空间压缩为一个整体,从而将世界压缩为一个社群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中故事的产生与发展并非是停留在一个固定不变的地方,而是在世界各地展开。小说的主要人物均生活在美国,这成为了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随着故事的发展,南美、欧洲、非洲也一一走入读者的视线。通过故事的讲述,这些不同的地方逐渐连成了一个整体。

《殿堂》中不同的地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被各个人物通过叙述一一联系起来。

沃克将整个人类统一到她的社群中。在这个社群中,无论种族、性别、阶级、年龄等,都得到包容。小说主要是围绕三条主线展开,主要人物包括:丽齐与哈尔,卡洛塔与阿维达,范妮与苏维洛。随着故事的发展,这三条主线交织到一起;除了这些人物,小说中还有大量的其他重要人物。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这些人物之间也相互联系起来,构成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在这些人中,阿维达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世界人”,他身上汇入了世界各地的血液:包括非洲、欧洲、墨西哥、印度、菲律宾、中国,当然还包括他目前生活的美国(Walker 393)。

当然在沃克的社群中,人类并非唯一的成员,整个生物界都是这个社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小说开篇,读者首先听到的就是丽齐的声音:“如果他们讲述关于我的故事时说谎了,那么他们对一切都撒谎了”(“Dedication”)。读者在完成小说的阅读之前都无法理解这段引文的含义。如果人们讲述关于丽齐的故事时说谎了,那么人们就对一切都说谎了,因为丽齐代表了“一切”。丽齐经过无数次的轮回转世,依然拥有每一世的记忆。每一次的轮回,她都过着不同的生活,拥有不同的身份。在不断的轮回中,她曾经是黑人、白人、男人、女人、女巫、妓女、侏儒、狮子等等。在死前她画下了自画像:“画中是一棵大树,树上有黑人,各种不同的生物,蛇和各种不同的事物,甚至有白人和很多狮子。”苏维洛告诉哈尔:“丽齐在她的最后一幅画中画下了自己。”(412)在这棵生命之树上,丽齐画出了每一个自己。经过无数次的转世,她经历了每一种生命形式,而各种生命形式也都在她身上留下了印记。无论是黑人、白人、男人、女人以及其他非人类的生物,都构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

丽齐根据对自己的梦的记忆,向苏维洛讲述了各种生物在大自然中曾经和谐相处的故事:人类曾经居住在大森林里,森林里到处都是树木。“当时的树木就像大教堂。每一棵树到了晚上就成为了居所。白天我们在树下玩耍。我们的阿姨和妈妈有时候带着我们,有时候就把我们交给大树照顾。当你了解大树的每一根树枝、每一个树洞、每一个裂缝后,没有任何地方比这里更安全。遇到危险时,你可以迅速躲入大树的怀抱。同时我们还跟其它生物一起分享大树的庇护。”(84)他们把森林中的动物们视作表兄弟,与他们一起嬉戏玩耍,互相作伴,互相保护。直到私有制产生,人类打破了这种和谐的秩序。他们屠杀森林中的动物,剥去它们的皮毛占为己有,烹煮动物作为食物。部落中的男性还自恃强大,将天生力量相对弱小的妇女和孩童占为己有(84)。在丽齐讲述的另外一个故事中,人类与动



物也曾经是朋友。她的妈妈有一个知交是一头狮子。“他们到哪儿都在一起。狮子也有自己的家庭。两个家庭之间来往频繁。在狮子的家里,我总是受欢迎的。在我所说的这些日子里,人们与动物的相处方式,就像是今天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大家彼此是邻居,共用相同的水源,吃着相同的食物。”(84)通过丽齐的叙述,读者看到了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可能存在并早已存在过的。

沃克通过叙述解构了男性与女性、黑人与白人甚至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思想。《殿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这个世界的机会。人类要再次建立这样的世界,就要彼此关爱。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其它生物之间,都必须和平共处的关系。西丽(Celie)在自己一生中经历了无数的痛苦经历,受到伤害时,她回到家里就去欺负自家的狗,把自己的痛苦转嫁给比她更弱小的生物。然而在莎格(Shug)的帮助和启发下,西丽开始平等对待周围的一切事物。“如果你在西丽面前踩死一只蚂蚁而不道歉的话,你将永远不会再得到她的邀请”(169)。

### 三、前文本语境压力:托妮·莫里森小说中不断建构的社群

除了沃克以外,托妮·莫里森也一直关注社群的发展,她的社群思想在1990年代逐渐发展成熟。莫里森几乎在每一部作品中都强调了集体的重要作用。她的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是对具体历史环境下的黑人社群的真实书写。这个群体将白人的种族歧视完全内化,从而摧毁了群体内最边缘化、最弱勢的成员。《秀拉》中的黑人社群建构了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标准。符合其标准的成员受到欢迎,而违反其所谓规则的成员则遭到排斥,并成为该社群失败的替罪羊。在莫里森前期的小说中,毕科拉(Pecola Breedlove)与秀拉(Sula)均遭到集体排斥,无法在集体中建构自己的身份,先后落得香消玉殒。1977年《所罗门之歌》中的集体与前两部小说相比有了相对较大的变化。在成长的过程中,主人公奶娃回到南部,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黑人社群,并因此找到了自己的根,从而在黑人群体中建构了自己的黑人身份。《宠儿》继续了《所罗门之歌》中正面社群的主题。虽然黑人群体一开始排斥塞斯,但也正是这个群体最后聚集到塞斯家院子里,帮助塞斯驱除了宠儿的鬼魂,拯救了塞斯和女儿。

在莫里森前期的作品中,“社群”都作为主角人物生活的背景而存在,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群,拥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规约。而莫里森在《天堂》中打破了自己以往对社群的书写模式,对集体进行了历时的探讨。

一个社群由不同的个人构成,社群的每个成员不断创造历史、丰富历史。同时社群和个人也在自我创造的历史中不断得到新的定义。《天堂》中的女修道院随着一个个成员的加入而处于不断的建构中,每个成员带来了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声音。小说中看似完全封闭的鲁比镇,也因女修道院的存在和影响而被迫打开。莫里森用一个开放的社群不断解构一个封闭的黑人社群,从而让社群一直处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被重构。

小说塑造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社群:鲁比与女修道院。对一个社群来说,共同的历史、经历使得集体得以建立并增强集体成员间的凝聚力。鲁比镇是一个对外完全封闭的黑人社群。这个社群的人来自相同的社会阶层,相互认识,他们经历了相同的历史,拥有共同的过去,从而形成了共同的团体,彼此之间建立了一种团结友爱的关系(bounded solidarity);同时他们又受到外部世界的隔离甚至是歧视,这些被孤立和歧视的人们也团结起来,形成了一种反应式的友爱关系(reactive solidarity)(Alberts 231-248)。

鲁比人及其祖先为了逃避外部世界的歧视而在边缘地区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社群。鲁比镇将自己的世界封闭起来,断绝了与外部的往来。鲁比人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他们离一座镇子有十七英里,而那座镇子离别的城镇都有九十英里之遥。”(莫里森 1)鲁比镇周围除了女修道院以外什么都没有,要在接近 100 英里以外才能看到别的城镇。同时从鲁比镇的公共设施来看,他们也不准备接待任何的外来人。鲁比是“一座沉睡的镇子。只有三座彼此相隔不足一英里的教堂,而为游人服务的项目却全不具备:没有饮食业,没有警察,没有加油站,没有公用电话,没有电影院,没有医院”(10)。鲁比镇在鲁比人看来是一座被时间遗忘的城镇。他们生活在自己独立的时间与空间中,生活在过去的历史中,似乎世界从未改变。他们拒绝外来人,拒绝新的声音、新的历史。

在这座镇子里,能够被认可的只有父权制的声音。祖辈的历史得以储存和传递,成为无可反驳的官方历史。女性和年轻一代的声音与历史却被抹杀。他们祖先的最初目标是想要建立一个兼容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再有人被歧视和排斥,因为他们曾经遭受了排斥,但是鲁比镇却慢慢变成一个他们曾试图逃离的白人世界的缩影。在这个世界里,肤色决定了一切,排斥一切外来的声音。对于这个社群来说,“外来人就等同于敌人”(207)。

与鲁比相反,女修道院虽然也被外界隔绝,但却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社群。女修道院也处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然而不一样的是,女修道院并不是一个自我隔离的社群,“她们被孤立最主要是因为父权制的鲁比镇把她们看作是威胁,将其隔离开来”(Michael 652)。然而它的大门永远是对外敞开的。女修道院随着成员的变化和增加,一直处在不断的建构中。

小说一共有9个章节,其中有5个章节是以女修道院的5个成员来命名。在这5个章节中,叙述者一方面从这5个女性的视角讲述了她们在来到修道院之前的历史,同时也讲述了她们加入修道院后的故事。这样一来,修道院作为一个集体,不仅容纳了每一个个体的故事,每一个个体的历史也丰富并重新建构了修道院的历史。她们聚在一起,共同书写、创造了女修道院新的历史。随着新成员的增加,修道院的历史一遍遍地被重新书写和定义。

从女修道院的构成来看:与鲁比不同,它是一个由不同种族、阶级、年龄等构成的混合体。成员包括白人、黑人、混血。她们也来自不同阶级,有来自富裕家庭的帕拉斯,也有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西莉卡。她们中间也有像格雷斯这样的同性恋者。除此之外,这些背景、年龄不同的女性之间也充满了矛盾。相对保守的马维斯和相对开放的格雷斯自第一次见面,就因性格各异而互生嫌隙,甚至后来还大打出手。但是这个集体却包容每个人的不同,让她们住下来后就舍不得离开。

不仅如此,修道院的大门还向鲁比镇敞开。由于女修道院的出现,女修道院的成员与封闭的鲁比镇的成员之间产生交往,逐渐影响鲁比镇封闭的生活,封闭的鲁比镇被迫慢慢开放。女修道院总是对鲁比的居民敞开大门。她们接待过醉酒的米努斯,照顾过受伤的比莉,看护过因照顾孩子而心力交瘁的斯维蒂和未婚先孕的阿涅特。在这些人最脆弱的时候,女修道院为她们提供了休憩的空间,让她们度过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可见,作为一个社群的女修道院包容集体的每一个成员,同时敞开大门欢迎不同的成员加入。这些成员又为这个社群不断注入新的历史,让这个集体永远处于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永远充满了生命力。

女修道院完全不同的生活理念及模式对鲁比的父权制造成了威胁。正如鲁比的男人所担心的,“她们不需要男人,也不需要上帝”(莫里森270),他们容不下这样的集体存在。小说的结尾,鲁比的男人们偷袭了手无寸铁的女修道院,残杀了女修道院的所有成员。然而屠杀事件发生以后,鲁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女修道院的女性们如基督一般,用自己的死亡,救赎了走向死亡的鲁比镇。自此在鲁比镇不再只有一种声音。关于这场战争发生的原因,官方说法就有两种,而鲁比镇上的居民都各有自己的看法。同时,摩根兄弟这对曾经一直保持一致意见的官方代表也发生了决裂,鲁比镇不再是一个声音做主,人们开始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代表进步思想的外来者——密斯纳神父被接纳,决定留下来继续为鲁比镇服务,因为他看到了希望。鲁比镇开始学会容纳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历史,长期处于静止状态的社群打开大门,随着新成员的加入、新思想的诞生、新历史

的书写而获得了新的生命。

与内勒不同,沃克所关注的社群是整个生物界。她解构了人类这个社群,将各种生物都统一到同一个群体中。莫里森在《天堂》中用一个开放、发展的社群解构了一个封闭、静止的社群,让社群保持在不断建构的过程中。然而沃克和莫里森无疑都用自己的方式解构了非裔美国文学中传统的黑人社群,解构了简单的二元对立,更多地关注了社群的包容性。黑人女性文学中这两个最重要的女性作家构成了内勒作品前文本最重要的一部分,必然会影响她的创作及读者对其作品的阐释。在这个时期,虽然格洛丽亚·内勒采用的方法与两位作家有所差异,但是也体现出了类似的思想。内勒以黑人社群为载体,通过对黑人男性群体的建构将整个黑人社群补充完整,使其更显包容性。“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弱势群体在表达利益诉求等议题时常常会失去话语权。”(唐青叶 59)然而当代黑人女性则采用自己特殊的策略,相互形成观照,构建了一个黑人女性的作家群。她们用自己的声音叙述社群的故事,无论男性与女性,无论白人与黑人,也无论人类与自然,都被统一到其文本中。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Alberts, Heike C. "Changes in Ethnic Solidarity in Cuban Miami". *Geographical Review (New Geographies of U. S. Immigrants)* 95, 2(2005): 231-248.
- Blackshaw, Tony. *Key Concepts in Community Stud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Ltd., 2010.
- Felton, Sharon and Michelle Loris eds. *The Critical Response to Gloria Naylor*.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7.
- Liu, Yu. "Social Semiotic Multimodal Research: A Meaning-based Approach", *Signs & Media* 8 (2014): 73-92.
- Michael, Magali Cornier. "Re-Imagining Agency: Toni Morrison's *Paradise*".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36 4(2002): 643-661.
- Montgomery, Maxine Lavon ed. *Conversations with Gloria Naylor*.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4.
- 托妮·莫里森《天堂》,胡允桓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Morrison, Toni. *Paradise (tian tang)*. Trans. Hu Yunhua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Press, 2004.]
- Naylor, Gloria. *The Men of Brewster Place*. New York: Hyperion, 1998.
- *The Women of Brewster Plac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 1983.
- Nelson, Emmanuel S. ed. *Contemporary African American Novelists: A Bio-Bibliographical Critical Sourcebook*.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9.

(下转第 77 页)

- China 3 (2005): 33-39]
- 杨周翰《攻玉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 [Yang, Zhouhan. *Jade Polishing: Selected Essays (gong yu j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3.]
-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 [—: *17<sup>th</sup>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shi qi shi ji ying guo wen xu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5.]
- :“King Lear Metamorphos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39, 3 (Summer, 1987): 256-263.
- :“序”乐黛云 王宁主编《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
- [—: “Preface” (xu).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ds. Yue Daiyun and Wang Ni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89.]
- :《镜子和七巧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 [—: *The Mirror and the Jigsaw (jing zi he qi qiao ba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0.]
- :“论欧洲中心主义”米佳燕译,《中国比较文学》2(1990):1-9,1(1991):21-46。
- [—: “On Eurocentricism” (lun ou zhou zhong xin zhu yi). Trans. Mi Jiay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2(1990): 1-9, 1(1991): 21-46.]
- 乐黛云“重读杨周翰先生的《欧洲中心主义》”,《中国比较文学》3(1999):1-8。
- [Yue, Daiyun, “Revisit to Professor Yang Zhouhan’s ‘Eurocentrism’” (chong du yang zhou han xian sheng de ou zhou zhong xin zhu yi).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3(1999): 1-8.]

~~~~~

(上接第65页)

- 唐青叶“身体作为边缘群体的一种言说方式和身份建构路径”,《符号与传媒》10(2015): 53-64。
- [Tang, Qingye, “The Body as a Way of Speaking and an Approach to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Marginalized Group” (shen ti zuo wei bian yuan qun ti de yi zhong yan shuo fang shi he shen fen jian gou lu jing). *Signs & Media* 10(2015): 53-64.]
- Walker, Alice. *The Temple of My Familiar*. Boston: Mariner Books, 2010.
- Whitt, Margaret Earley. *Understanding Gloria Naylor*.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9.
-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 [Zhao, Yiheng, *Semiotic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fu hao xue: yuan li yu tui yan)*.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 :《广义叙述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
- [—: *A General Narratology (guang yi xu shu xue)*.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2013.]